

商王权政治基础的人类学观察

——另一视角下的商代青铜器

陈洪波

(复旦大学文博系 上海 200433)

On basis of theories of kingship's origin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article reviews bronze wares as core characters among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considers systematically political basis and function of Shang Dynasty from th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Key words: Shang Bronze wares Anthropology Kingship

内容提要 以西方文化人类学中权力起源的理论为根据,以作为三代文明核心特征的青铜器为对象,对商王权的有关政治基础以及运行机制从另外一个角度作了一些系统思考和分析。

关键词 商 青铜器 人类学 王权

中图分类号 K876.41

文献标识码 A

对于青铜器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重要性,张光直曾经做过一个很高的评价,他说:“像中国这样的青铜时代在人类中是一个极端‘独一无二’(unique)的概念和存在;青铜器既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又是产生这种象征的因素。在数量上,我们非常显明地注意到在中国所发现的古代青铜器,要比任何其它古代文明中为多;我毫不犹豫地大胆宣称:就已经发现的铜器来说,在中国古代所发现的青铜器的量,可能大于世界其余各地所发现的铜器的总和;在中国所发现的青铜器的种类,又可能多于世界其余各地所发现的青铜器的种类的总和。人类的进化史上,不论在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化的程序或原因上多么相似,青铜的重要性像在中国这样中心性的,是少而又少的。”^[1]

考古发现表明在仰韶文化时期即已出现铜器,在龙山时代,发现的铜器或冶铜、铸铜遗存更多,但遗物主要限于小件工具和饰品,到龙山时代晚期才出现了复合范铸造的铜铃、釜等^[2]。

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冶铸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发掘材料证明,二里头时期已经有了规模较大的铸铜作坊,并且制造出迄今所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青铜礼器,包

括爵、斚、鼎等容器,以及戈、钺等兵器。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的出现,改变了新石器时代以玉器和特殊陶器为主要礼器的局面,开始形成了以青铜器为中心的礼器群,并依此构筑起以这些礼器群为象征的宗教信仰体系和社会政治制度,这一信仰体系和政治制度为商周所继承和发展,青铜器遂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和重要特征^[3]。

如果说二里头时期的青铜器还带有相当原始性的话,那么商代的青铜器则迅速发展,特别在晚商时期达到了中国青铜手工业的一个顶峰,昭示了古代中国独特的意识形态、宇宙观和政治制度的日臻完善,并对后来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20年来,随着文明和国家探源工程这一世界性重大课题在中国的逐渐推进,在早期文明产生发展过程中占据极其重要位置的青铜器也更加受到重视,研究重点也逐渐从传统器物类型学和编史学方面深入到其社会政治功能方面。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了青铜器作为三代国家的政治工具、财富手段、军事力量对于确立和行使王权的重大作用,这其中以张光直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本文尝试以西方有关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为指导,结

合考古和文献资料,对青铜器在商王权的来源和维护方面的作用做一番初步的探讨。

一 早期政权基础的人类学探讨

关于人类早期复杂社会演进的政治进程或者说动力机制,包括酋邦以及早期国家的产生和政治控制等问题,从很早时期西方学者们多有论述。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理论包括·塞维斯的酋邦理论,认为酋邦的特征就是因为要应付地区经济专门化的危机而进行资源的再分配,酋邦首领执行的是一种再分配的协调性职能^[4];威特福格尔的灌溉说或者水源论,认为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大规模灌溉工程组织和管理的需要导致了社会政治机构的产生^[5];卡内罗的战争说,认为战争是国家起源的决定因素^[6]。另外还有自然发生说^[7]、人口说^[8]、贸易说^[9]、多变量反馈和互动综合理论^[10]等等。

这些来源多样、立论各异的观点,其理论面貌和思想内涵是十分复杂的,但是大多比较侧重于一个方面,试图从单一或少数动力因素出发,而得出普遍性的理论概括。而实际上世界上各个地区之间,由于环境条件和社会传统差别非常之大,早期政体政治制度的发展道路是千差万别的,其动力机制当然也是多种多样。

斯特普尼蒂斯(Vincas Steponaitis)曾把首领们为获得、扩展以及独占权力可能采用的主要策略总结如下,大约包括以下10项:

1. 通过借贷、宴饮、赠送等行为以获得群体的拥护
2. 对基本生存方式有革新性的贡献
3. 设法控制人群的自由活动,使他们只能生活在一个有限的区域范围之内
4. 在内部完全使用武力,进行高压统治
5. 缔结与外部的联系,以获得外来力量的支持
6. 增加下属人数,以扩大自己的力量
7. 以大家都承认的现存法则进行统治,包括历史性的、超自然的、自然的各种法则
8. 创造或采用新的法则进行统治
9. 控制内部贵重物品的生产和分配
10. 控制对外部贵重物品的获取^[11]。

以上10项策略,简明扼要地概括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从民族学和考古学案例中所观察到的早期复杂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各种基本动力机制,具有一定的涵盖度和普遍性。

这10项策略,大致可分为经济、军事、意识形态3个方面,表明早期政治制度之进程,基本上都是通过经济控制、军事手段和意识形态这3种主要途径进行的。

经济控制直接体现在策略1和2中,首领们通过控制生产和分配方式来掌握权力。如果一群人的生存操纵在另一群人手里,那么他们只能选择服从,这样后者的领导权便得以发展起来。进行控制的财政基础,根据支付媒介的不同可以区分为产品经济和财富经济两种类型。产品经济(staple finance)通常是指食物和日常用品的征集和分配,这是进行经济控制的重要方面,而财富经济(wealth finance)的对象是指具有象征价值的贵重物品,首领们通过长途贸易或专业手工业生产得到它们,并用以馈赠支持者。一般而言,人们渴望拥有这些贵重物品^[12],因为它们象征了个人的社会等级和经济地位。在实际案例中,以上两种控制方式常常是结合使用的。

军事手段表现在策略3~6上,贵族们对内推行高压统治,对外征服和结盟。战争被认为是酋邦和国家阶段绝大部分政体的共同特征,军队被用来征服新的群体,迫使其缴纳贡赋,对那些不愿意纳贡的群体进行武力威慑。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尤其是金属出现以后,一种通过武力进行统治的技术便被创造出来,并且日臻完善。

意识形态方面的手段包括策略7~10,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强调首领作为维护宇宙和社会秩序的代表,以此来强化其地位和权力的合法性。同样重要的是,早期复杂社会十分重视外来意识形态和权力象征模仿,这代表了与宇宙超自然相联系的深奥知识,常常与“世界风格”(world style)有关,它使得掌权贵族能够作为一个独立阶层凌驾于平民之上。贵族们以其他人难以得到的贵重物品作为权力的象征,用其外部来源(往往与神祇相关)来证明自己地位的神圣性和合法性。这些贵重的奢侈品总是与权力相关,用作诠释地位的标志和确立政治等级与从属关系的媒介,使无形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物质化和制度化。在这个方面,用长途贸易来控制外来物品的流通和分配就变得很重要,因为控制了这些物品就控制了权力的符号,以用来吸引和震慑臣民,以及奖励笼络那些归附和臣服的异族社群。

上述权力基础的三个组成部分(对经济、战争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策略。政体的权力形态一般是相当复杂的,有效的统治似乎有赖于多种不同策略的结合使用,以便应付复杂社会运转中出现的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并克服单一权力基础的局限性。

二 商王权政治基础的青铜器因素分析

夏商政权按照中国传统文献的理解和考古学的某些发现,虽然确定已经初步进入了国家时代,但其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与后世成熟的国家体制有非常大的差异,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早期政体的政治特征,这是政治进程中上一阶段无可避免残留下来的影响。张光直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认为采用当代社会进化理论的标准对夏商两代和西周前期进行酋邦或国家的界定确乎存在一定的困难^[13]。这一前提条件,为采取上文所述西方人类学理论进行权力来源的分析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可能性。

早期王权的政治基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仅从以青铜器为代表的贵重物品角度来加以分析,青铜器明显提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中所述王权的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的来源,在早期政治统治中发挥着非常突出的核心性作用。夏代资料不甚充分,这里仅就商的情况试述之。

1. 经济

商王朝的经济基础十分复杂,可能兼具产品经济和财富经济两种方式的共同特点。

与产品经济有关的经济事务,商卜辞中明显缺乏记录,在考古记录中也不易判断。从殷墟发现的实物资料来看,各种经济资源的输入量相当庞大,如谷物、野兽和家畜、手工业品和各种服役等,这些资源都来自各邑的贡纳和商王的索取,而从商王国向外的输出却非常少见。经济资源明显呈现一种向上和向心的流动,一致流向商代社会的上层和聚落网中的大型城邑^[14]。

与以生活资源流动与集中的情况有所不同,以青铜器为代表的贵重物品的流向要更清楚一些。卜辞中偶尔会记载商王赐给地方诸侯礼品的情况,但更重要的是,当诸侯们收到贝壳和青铜(二者都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时,他们常会制作青铜重器以记之,由此在某些青铜礼器上留下此类记载。据张光直统计大约有50件青铜器有纪念王室赏赐的铭文^[15]。

青铜器在商代代表了巨大的财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16]。青铜器的这种财富性质,来源于在当时它是一种来自远方的稀有金属,在原料采办、工艺设计和铸造生产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劳力,凝聚了巨大的劳动和智慧,并包含了神秘知识和艺术创造力等等多方面的因素。

张光直认为古代中国是一种连续性的文明,

在生产技术没有根本提高的前提下,依靠政治程序达到了财富的绝对积累和相对集中,奠定了文明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17]。观察商王朝的经济特点,财富集中似乎主要表现在贵重物品上,例如青铜器、玉器、海贝等物。从财政方面来说,商采取的是一种财富经济(wealth finance),国家的财政似乎主要是通过这些贵重物品作为媒介来运行,王权通过对这些贵重物品的操控在经济层面得以实现,这具体表现在商王室对以青铜器为代表的财富的独占,并以这些物品赏赐诸侯。张光直曾经认为青铜在商代主要用于祭祀和战争^[18],现在我们知道,青铜器作为财富符号方面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提供了除了意识形态和军事技术之外的另一个权力来源。

在这种财富经济中,商王室对青铜手工业的独占在考古学和文献上有较充分的证据,其经济意义在于它是当时社会财富的集中代表,通过这种便捷的媒介,商王室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迄今所发现的典型商青铜器的数量(包括传世品和发掘品)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是一笔极为巨大的财富。商王室对这种财富的独占通过两个方面加以进行,第一是对矿料来源的独占,对这个方面我们下文还要详细说明,第二是对青铜铸造业的专控,这在考古资料中有强有力的证明。财富经济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商王室利用这些物品对诸侯实行的经济控制。前面已经提到卜辞和铭文记载的商王对诸侯的赏赐情况,这可能体现了财富在统治阶级上层的“再分配”^[19]。商王以这种手段来馈赠支持者,而人们当然也渴望得到这种代表了财富和地位的物品。通过这种财富的“再分配”,以青铜器为手段的经济控制延伸到整个王国以及商文化分布区之外。当然典型商式青铜器的广泛分布不仅仅代表了王室的赏赐行为,应该也包括大小诸侯之间类似的分配活动,以及大量的非政治性的交换行为。

2. 军事

青铜在军事方面为商王权提供了另外一个重要来源,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商代青铜器的种类,除了礼器为大宗的容器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兵器以及车马器。

商代的青铜兵器,在早、中、晚期都有发现,在早、中期主要发现在郑州、偃师、辉县、藁城、黄陂盘龙城等地,晚期则主要见于殷墟地区,无论从种类和数量,早中期都不如晚期多。商代兵器大多出于墓葬中,祭祀坑、车马坑及居址、作坊遗址或有

少量发现。按功能可分为进攻性兵器和防御性兵器两大类,前者包括铜质的戈、戣、矛、戟、钺、刀、镞、斧、铍等,后者有铜质的胄和非铜质的盾、甲等。另有个别器类如弓形器用途尚未得到确认。其中钺的情况较为特殊,绝大多数出于墓葬中,从共存青铜礼器所显示的墓主身份表明,只有具有相当地位的贵族才能拥有和使用铜钺,钺应该是王权和军事统帅权的象征。这是铜钺不同于一般兵器且出土数量不多的原因。车马器上的铜件主要包括马衔、马镳、节约、各类兽形饰、铜泡、𦍋、𦍋、𦍋、策、辖、𦍋、轅端饰、踵饰等^[20]。

商是一个军事力量非常强大的国家,其战争技术与周边部族相比明显处于优势。除了军事组织的力量^[21]之外,青铜所提供的兵器和战车等这种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不可忽视。当前关于商代武器和车马器的资料非常丰富,足以使人们对此有充分的认识^[22]。

强大的军事力量给商王权提供了不亚于意识形态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商王室用以对内控制,对外发动战争。商晚期的都城殷墟至今还没有发现城墙,也许说明这种强力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而文献中记载商王对外的战争是非常频繁和激烈的,如对西北獯方、土方和羌方的战争,武丁对荆楚之地的征伐,对东方的人方和兰夷的征伐。卜辞中这些战争记载基本属于晚商时期。战争的性质,除了抵御这些部族的侵扰,迫使其称臣纳贡,掠夺金属、食盐等自然资源可能也是重要目的^[23]。

3. 意识形态

在当前的研究中,三代青铜器所包涵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最为学界所瞩目。

在与世界其它各地的青铜文明比较之后,张光直提出了中国青铜文明的特点,即它并没有用作一种变革性的生产技术发挥作用,而是成为了政治权力的工具,用于祭祀和战争。政治与宗教艺术是结合在一起的,作为通天工具的艺术,在政治权力的获得和巩固方面所起的作用,可以与战车和戈戟、刑法这种统治工具相比。这在以作为商周艺术核心的青铜器中的九鼎传说上看得很清楚。古代王朝占有九鼎,就是独占通天手段的象征。

《左传》记载,各地特殊的通天动物都为王朝服役,以“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王掌握了各方国的自然资源和通天工具,就像掌握了最有力的武器一样,是掌握大势力的象征。《左传》里讲“贡金九牧”,

《墨子》里讲“折金于山川”,就是对各地自然资源的掌握,而自然资源中的铜、锡矿产就是铸鼎的材

料。所以,九鼎不但是通天权力独占的象征,而且是制作通天工具原料独占的象征。九鼎传说始于夏代,王权的政治权力来自九鼎,对九鼎的象征性独占,就是对古代艺术品的独占^[24]。

青铜器所表达的意识形态作为商王权的来源,至少存在三个方面,一是青铜器矿料的来源;二是青铜铸造技术所代表的神秘知识的独占;三是祭祀行为以及兽面纹等青铜器纹饰所表达的宗教含义。另外还有与“世界风格”(world style)的联系。

第一,青铜器矿料的来源。

青铜器的矿料来源多年以来一直备受关注。从目前对殷墟出土的部分铜器的检测^[25]来看,至迟晚商时期铜料产地应是多渠道的,殷墟铜器大部分无磁性,而少部分有较弱的磁性,因此铜料应不是单一来源,更非单一类型的铜矿石所炼就。

在石璋如研究^[26]的基础上,张光直曾经认为夏商周三代矿料应该出自华北大平原边缘的山地,以豫北、晋南为中心,这里分布着许多小规模铜矿和锡矿,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三代都城在这个范围内屡次迁徙就是为了追逐铸造青铜器所需要的矿产^[27]。但现在看来,商王朝的中心地区,虽然也可能有小规模的采铜点,然而从江西瑞昌^[28],以及湖北大冶、阳新^[29]等几处铜矿遗址的开采起始年代和商文化在上述地区的分布情况看,商代铜料来源的主渠道当在南方,很可能即为长江中游地区。近年已有学者强调长江中游铜矿资源对于商代青铜文明的重要性,业已发现的江西瑞昌铜岭和湖北大冶铜绿山等铜矿遗址,是当时重要的采铜中心^[30]。有学者推测商代开采锡矿可能性最大的地点,应为今江西赣州和广东汕头一带^[31],或云南永善金沙^[32]。还有学者从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的结果推断滇东北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矿料的主要来源^[33]。

这些矿料的分布点大多在商文化分布区之外,获得这些矿料所采取的手段并不是非常清楚。长江中游的有些地方可能是商王室直接派员进行采掘,而有些地方可能会以军事武力掠夺或迫使对方献纳,盘龙城城址的存在可能发挥了以上两种作用。而在远离商势力范围的地区,如滇东北,使用贸易或交换方式获得这些原料的可能性则更大一些。总起来看,交换和贸易似乎是一种主要方式^[34]。

无论采取何种手段,由于这些物品来自非常遥远的距离,并且得之非常不易,对于中原政体来

说,恐怕只有王室的力量才能得到它们,这实际上使王室变相独占了这一通向权力的主要渠道,而把其它人排除开来。垄断这种罕有的贵重资源的来源,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商王的神圣和威权。

第二,对青铜铸造技术的独占。

在控制矿料来源之后,对青铜器全过程的独占进一步体现在青铜铸造中。特别是晚商时期,青铜铸造业是商王室直接控制的产业,体现出王室的高度重视。

从现在考古发现的铸铜遗址的分布来观察。早中商时期:郑州商城2处,发现大量遗迹和遗物,另外,偃师商城、东下冯商城、盘龙城商城、小双桥遗址及南阳十里庙等地亦发现有与铸铜有关的遗迹、遗物。对遗物的统计发现,早、中商时期的青铜器是以生产工具为主,武器和容器数量较少,若从时间上看,早商一、二期工具范占绝大多数,早商三期至中商一期容器范呈上升趋势,占到四分之一上下^[35]。这既体现了铸铜工艺水平的逐渐提高,也可能反映出对容器重视程度和需求量的不断增长。晚商时期的铸铜遗址以殷墟最为集中。目前在殷墟已发现4、5处铸铜作坊,分别分布于苗圃北地、孝民屯、薛家庄和小屯村东北地。殷墟宗庙宫殿区和都城范围内诸处铸铜遗址,都应是商王室直辖的作坊,它们充分展示了商代晚期青铜手工业中冶、铸分离,各作坊间产品已有较明确的专业分工和庞大的规模。大型熔炉和大型陶范的出土,则表明制作大型青铜重器的熔铸技术已经得到解决^[36]。

这些铸铜作坊,特别是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完全属于以王室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上层所有,掌握青铜铸造技术的工人与他们的关系还不好推测,但应该是一种被管理之下的依附关系^[37]。

第三,祭祀行为以及兽面纹为代表纹饰的宗教含义。

通过青铜器这种媒介,商王权能够获得历史性的和超自然的两种合法性。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代青铜器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它的祭祀作用,祭祀最主要的对象是祖先。对祖先的盛大祭祀是一种当政者才有权从事的行为,因为通过对祖先的祭祀,祭祀者便发生了与过去历史的联系,从而从中获得了权力来源的某种合法性。

青铜器中王权的超自然的合法性原则主要体现在祭祀中的巫术行为和商王的巫觋角色中,而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38]充当了通天的媒介,是巫觋的

助手(实际上王本身常既是巫^[39])。以青铜为核心的古代艺术,实在是通天阶级的一个必要的政治手段,通过这个工具,政治、宗教和艺术结合在一起。关于这个方面,张光直有较为详尽的分析^[40]。

动物纹样所提供的商王权的来源,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兽面纹等纹饰(包括饕餮纹、夔龙纹等)作为一种外部来源的神秘知识所具有的力量。许多人注意到,三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与良渚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的兽面纹有一种密切的联系,例如李学勤曾经说:“商代继承了史前时期的饕餮纹,这不仅是一种艺术传统,而且也传承了信仰和神话,这在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上无疑是很重要的问题。”^[41]以兽面纹施之于青铜器,似乎也代表了商王拥有甚或独占了这种历史悠久而且是外部来源的神秘知识,也增加了其地位的神圣性和威权。

除了在商文化分布区之内有大量商式铜器出土之外,在商文化分布范围之外的地区,也有典型的商式铜器出土。这种状况肇始于中商时期,晚商时期更是如此。典型地点如黄河两岸的晋陕高原、关中西部、陕南汉中地区。四川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湖南湘江和澧水下游以宁乡为代表的多处遗址,江西赣江下游以清江、新干为代表的地点,广西武鸣县全苏,北方燕山地区以北京平谷刘家河为代表的地点等等,都发现了商代青铜器^[42]。对这种现象,徐良高曾经提出“青铜礼器文化圈”的概念加以解释,认为原因首先应归结于青铜器特别是青铜礼器在商王朝时期的特殊地位,它既是权力与意识的物化形式,同时也是财富的象征,因而在对外战争、朝贡与赏赐等交往过程中,青铜原料和青铜礼器就成为交流的核心内容甚至争夺的对象。随着青铜手工业的发展,到晚商时期“青铜礼器圈”这一文化现象已明确形成^[43]。这种“礼器文化圈”也可以用文化人类学上的“世界风格”(world style)加以解释。商代青铜文明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在当时已经成为“世界风格”的代表,周边文化区与之交流和模仿,构成了一个大的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之内,商王因其精美的青铜器,无疑拥有最为尊贵的地位,所以这也构成了商王权的一个来源。

三 小结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在商王权的政治基础构成上,青铜器确实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核心性作用,这突出体现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与多种政治策略都有密切的关系,从而为商王

权力提供了多方面的来源。具体对照文化人类学案例研究中所总结出的早期政体权力形成的 10 项常见策略,我们可以看到商青铜器至少与其中 5 种策略密切相关。包括,策略 1:以之进行交换、贸易和赏赐,策略 4:使用武力对内进行高压统治,策略 7:以祭祀来获得与历史和超自然的力量有关的合法性,策略 9:对青铜器的生产和分配进行绝对的控制,策略 10:控制青铜矿料的获取^[44]。但是商青铜器的政治功能决非限于这 5 项策略,而发挥了更大范围的作用,例如在军事技术方面的作用。以上方面既与世界其它早期政权的共同发展道路有类似之处,也体现了商王权形成和运转的个性特点。所以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商王权的政治基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决不仅仅局限于文章中提到的这些方面^[45],青铜器所涉及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本文论述也未必全面。

本文以有关文化人类学理论,通过青铜器来分析商王权的来源,与其它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果相比并无本质的不同,区别之处在于这种分析采用了另外一种视角,因为有理论上的支持而使立论似乎显得系统和条理,而这样也许能够使人们对这一关乎文明起源的政治进程有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

[1][2][40]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版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

[3][20][22][34][35][36][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4]Service ER.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p. 144 ~ 146.

[5]Wittfogel K.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6]Carneiro RL.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cience, 1970, 169: pp. 733 ~ 738.

[7]Childe VG. Man Makes Himself. London: Watts & Company, 1948.

[8]Dumond DE. Population growth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In: Spooner B. ed. Population Growth: Anthropological Implication, Pennsylvania: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72, pp. 286 ~ 309.

[9]Tathje WL.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owland classic Maya civilization. American Antiquity, 1971.

[10]Adams RM.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11]Earle T. The evolution of chiefdoms. In: Chiefdoms:

power, economy, and ideology. Earle T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 ~ 15. 这是一篇关于酋邦讨论的综述,本文对有关理论的介绍主要出自这篇文章。

[12]贵重物品,代表了对财富的拥有,基本含义是具有财富价值的东西,如金属器、玉器、贵重陶器和装饰品等。

[13]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1999 年。

[14][19][21][23]张光直著、张良仁等译:《商文明》,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第 228 ~ 234、242 ~ 253 页。

[15]张光直等:《商周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62,台北 1972 年。

[16][27]张光直:《三代社会的几点特征——从联系关系看事物本质两例》,《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 1986 年 5 月,第 94 ~ 132 页。

[17]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1999 年 9 月。

[18][24]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1999 年 9 月。

[25][31]申斌:《商代科学技术的精华》,《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编辑部 1985 年。

[26]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6,台北 1955 年,第 102 ~ 103 页。

[2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江西文物》1990 年第 3 期。

[2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遗址东区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2 年第 3 期。

[30]华觉明、卢本珊:《长江中下游铜矿带的早期开发和中国青铜文明》,《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15 卷第 1 期。

[32]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33]李晓岑:《从铅同位素比值试析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2 期。

[37]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50 ~ 259 页。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433 页。

[41]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 年第 5 期。

[43]徐良高:《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年。

[44]策略 2,虽然可能商王权有条件以青铜技术对生产工具进行根本性的革新,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而在南方遥远的新干大洋洲,似乎存在另外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45]另外还有比如宗族血缘关系在政权形成和运转中的作用,这是中国文明区别于世界其它文明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当然还存在另外一些构成政治基础的因素。